

天 宫 图

王剑冰 主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书 名：天宫图

作 者：闫连科

出版社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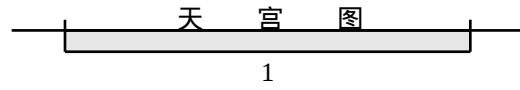
ISBN：7-5399-2182-X

中图分类号 I247.7

定 价：28.00

目 录

1	横 活
40	瑶沟的日头
104	天宫图
139	黄金洞
212	朝着东南走
246	三棒槌
257	思想政治工作
267	黑猪毛 白猪毛
283	去赶集的妮子
294	奴 儿
305	阎连科论 姚晓雷
319	作者主要著作目录



横 活

《东京九流人物记》之一

鲁耀这个人物，在清光绪中叶至民国八年，是汴梁城著名的光棍，独霸杠局的杠头。是时的士大夫阶级褒其豪爽豁达，肝胆照人，称之为名士，尊之为先生；一般骚人墨客，赞其倜傥不羁，滑稽风流，誉之为诙谐家；城市贫民，因其常解义囊，时受赈助，呼之为鲁善人；而走江湖的，更以其有求必应，讲江湖义气，公认为众望所归的把子，三百六十行的“点穴师”。因之声震中州，誉满梁苑。迄今汴市八十岁以上的耆者，对其一生之所为，仍津津乐道。

以上为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《汴梁琐记》中的一段颂赞文字，说的就是我鲁公。照今人交往之规矩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：我，姓鲁名耀字明远，祖籍山东，迁居大梁，生于公元一八五六年，卒于公元一九一九年，享年六十三岁。自幼家贫，父母早亡，无力供读，仅上二年私塾。一百三十多年以后，我回忆起来，还依稀记得，其时学习算不得努力，但写字背文诵诗都还算得伶俐，这也为日后飞腾垫了基础。说飞腾，不仅词不确切，意也过了。然无论如何，一世活得还算精神，乐哉游哉，洒洒脱脱，现今的世人，是万万不能和我并论的。可惜死得过早，成了一种后悔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死也就死了。有一段年月，你们千万世人，都如学生跟着先生诵书一般，齐声高呼：“人总是要死的，只要死得其所……”我们那边的人听了，觉得这话在理。我想我死了，也算得了其所。活着精神，死了也自然精神。向你们招呼一声，这是因果。

客官,以下便是正文。

清光绪中叶,仲春时节,有一日,风和日丽,东京城里的国槐,其时候叶都墨绿,枝条被旺盛的汁液鼓胀着,鞭子般扬在空中,大叶井然有序地叠在枝条上,把大街小巷裹在浓荫里。城中心的鼓楼广场南,大相国寺东门大街,就是现如今人们到京必游的马道街,在树阴下伸展着,来往行人闲散商客如雨天蚂蚁搬家在街面拥涌。脚步声、唤卖声、寻人声、吵闹声,汇成一条浊水大河,翻翻滚滚。酒楼、饭店、香药铺、茶肆、戏园,像礁石般稳在那河水中,把千万种声音撞得哗哗稀碎。这个时候,正是午饭的当儿,从鼓楼西北角的“京古斋”下走过来一个人,来人穿件薄布长袍,油污把本色盖了,一身都是亮腻腻的脏,像是剃头匠的洗刀布,谁见了,都觉恶心。他相貌极是平常,长脖子尖嘴,眼又小又圆,走路有些微趔趄。肩上背一个脏污褙褡,内里鼓鼓突突。他来到鼓楼广场四下打量一阵子,从褙褡里取出一副香骨板。这香骨板是两条牛的大腿骨,干了,呈出黄白色,上扁下圆,如半个扇面,下端的自然手柄末梢上,系了多色的红绿绸条,上端中心骨的两侧旁,打了两个不透眼,各系一对铜铃,饰着五彩丝穗。他略一定神,两手就各执一块香骨板,在空中哗哗一摇,把周围的人先警醒一下,然后两板相敲,铃铛伴奏,高声唱起来:

平生头次到东京,一步三迷难出城。
东瞅瞅,西看看,眼前一片杂货店。
杂货店,杂货行,走过苏州漂过洋。
海参海带出海外,陈州出的黄花菜。
黄花菜,不用刀,做时不离花胡椒。
小小胡椒圆又圆,漂洋过海到河南。
花椒小小麻又麻,出在东北山垓垓。
不是香料卖得贵,一道关口一道税。
说真罗,唱真罗,掌柜报税我见过。
长的香,短的炮,初一十五它先到。
大火鞭,小火鞭,逢年过节它占先。
黑糖香,白糖甜,谁要买糖来找咱。
东街大嫂有了喜,来买咱的江南米……

这人唱的是“莲花落”。莲花落需有竹板伴奏,就像那段年月时,学生们打着竹板唱‘竹板一打哗哗响,有段佳话我来讲,俺村有个王大娘,忆苦思甜泪汪汪……’那样唱,离开竹板是不能出口的。可这人,不仅不用竹板唱,且香骨板还敲得那么有节奏,铜铃也响得那么有致,这就把人惊了。接下去,又听他唱出那么一排子马道街的杂货曲。于是,街头上立马围起了人群,像看名旦演戏般把他围起来。半是热闹,半是惊疑,人们都站着不动,静静听着,只几个矮子在人的胳膊弯下朝里猛挤。短短一曲莲花落,唱尽了马道街杂货经营、花色品种、产地来源,着实让东京客商大开眼界。当他唱到‘生意好,生意旺,光卖现钱不赊账’时,从人群里挤进去一位先生,眉开眼笑,不言声,拿出几个制钱塞进他的袂褶,转身便出了人群。

这先生是马道街专门经营佐料的“兴隆香料店”的掌柜。那唱莲花落的松松肩上袂褶,瞅着掌柜后身,转口就唱道:

生意好,样样全,掌柜不在乎几个钱。
赏了钱,我道谢,再到下边把盘缠借。

唱罢,他以惯常的“紧三下,慢三下,不紧不慢又七下”,连击十三而告终。最后一下击过时,立即两板相合,以手扞之,余音未发,戛然而止,然后朝着四方三鞠躬,共计十二礼,又收了几个制钱,走出人群,就正式进了马道街。

这马道街本是东京的繁华去处,商业中心。原名叫寺东门大街,因为坐落在大相国寺的东门前,这么叫了数百年。可到了明代中叶万历年间,坐镇东京的周王六世康王勤熄,笃信佛教,又酷爱骑马,时常驾临大相国寺拜佛听经课,他和他的随从就把坐骑拴在这条街上。日月久了,为了方便,就在街南建下马房一座,有专人为其照料马匹,寺东门大街也遂被他改名为马道街。到了明末时期,黄河一次泛滥,马道街也随之荡然无存,留下的只是空空的一片阔野水洼。水息后,大相国寺西面的铁佛寺以东,迁徙来了二百多户人家,多半是陕甘的回族难民,他们中间有一批伊斯兰教马贩子,在此做起贩马生意。马道街成了试马场。到光绪十五年前后,

有位南方富商,姓王,在铁佛寺南开了个百货铺子,字号为“洋货大商店”。随后,马道街两侧就多了许多店铺。到清光绪中叶,这儿已经是店铺林立,商人熙攘的好去处。窄窄一条街上,店铺门前的镀金字号牌,长的,短的,宽的,窄的,竖的,横的,一街两行,满满悬挂,极为醒目招人。这些字号,异常讲究,文章大都做在“吉利”二字上。如福、祥、乾、盛、仁、利、泰、益、丰、昌等,最有名的是老字号的中兴楼、乾坤堂、马豫兴、元隆、老宝泰、义丰厚。

此时,那唱莲花落的,进入马道街,两只小眼朝上吊着,盯着那些字号牌,痴怔一会儿,又打起香骨板,哼出一首油滑律诗来:

顺裕兴隆瑞永昌,
元享万利复丰祥,
泰和茂盛同乾德,
谦吉公仁协鼎光,
聚益中通全信义,
久恒大美庆安康,
新春正合生成广,
润发洪源厚福长。

念罢,走到马道街中间的“宏财馍店”前,看看那又白又大的麦面馍,朝掌柜深深鞠了一躬,把香骨板向前一伸,旋即拉回来,“擂鼓三通”以壮声色后,便振振有词道:

拜罢他,再拜你,看看掌柜的好生意。
走就走,挪就挪,掌柜卖的好蒸馍。
馍又暄,面又硬,买主看看都高兴。
蒸的卷子四方方,一个一个摆桌上。
你的蒸馍圆又圆,能卖五湖四海钱。
光卖蒸馍还不算,余外还带机器面。
面条好,秤公平,买主吃了都传名。
唱得掌柜高了兴,顺手拿钱朝我送……

这店掌柜是个胖老头,腰里围了白腰布,听他唱完了,朝他肩上拍了几下,问:“哪里来的?”他说:“山东。”好嘴口。“不敢,儿子是跟着老爹你学的。”那掌柜一笑,从腰布兜里取出一个制钱,外加一个雪白蒸馍递给他,他就又深鞠一躬,退着出了“宠财馍店”。

就这么,见了“顶德理发铺”,他唱“七步走,八步留,一行青丝挂门头。不论公子与王侯,按着头皮水中揉……”见了“同仁药铺”,他唱“同仁号,啧啧香,施礼搭躬拜药王……”见了粮行,他唱“三步高,两步低,迈步来到粮行里。先开粮行汉钟离,后开粮行伍子胥……”走过短短一条马道街,他统共唱了二十余段莲花落,讨要了二十多个制钱、一个蒸馍、两根油条、一碗胡辣汤。几天的饭食有了着落,他刚想坐下把两根油条吃下去,忽然一转身,发现身后竟围了十几个讨饭花子,一个个脏污衣服,蓬头垢面,大的有六十几岁的老头儿,小的是十二三的孩娃儿,眼睛都盯着他的手,眼珠仿佛立马就要流出来。那架势,仿佛他偷了他们物件儿,不还时就要下手抢。

看着这帮讨饭花子呆了一会儿,他问道:“谁是‘当家的’?”

老汉问:“你是刚入城?”

他答:“从山东来的老二。”

老汉说:“东京的花子少‘教行’,都是‘单杆儿’讨饭吃。”

他想了想,道:“世上三大帮,有钱的财主为一帮,抢钱的绿林为一帮,乞讨的杆儿为一帮。‘丐儿不成帮,饿死没人扛’。没有教行哪成呀!”说着,把油条分给孩娃和老汉几个“杆儿”,又从袂褶和长袍袖里取出制钱,一人分了一个,把香骨板往袂褶里一丢,将袂褶摔在肩上,朝着铁佛寺扬长去了。

他腿虽趑趄,路却走得极快,随着两只胳膊的摆动,袂褶在他肩上一跳一跳的,若不是长袍屁股那儿有一片格外油亮的污渍,你断然不会觉出他是一个单杆儿叫花子。

此人便是我鲁公。

是年我二十九岁,饭已经讨要了十余年,南到武汉,东至徐州,西到洛阳,北过黄河,在“穷教行”当家也很有几年了,叫花子这碗饭已吃得轻车熟路。要不然,莲花落怎么能唱得那么溜口儿。

要讲我活的一辈子,就得从我初入东京说起来。为了能在东京“穷教行”里成为当家的,我从大南门入城后,先在小巷子里讨了三天吃,闲下时就去马道街观景,夜间宿下来,就编那莲花落的曲段儿。在徐州讨了三年饭,我是香骨板丐帮的当家儿;到黄河北时,又作徒儿学了莲花落。如今的东京老翁,你若问起他旧时的丐帮儿,没有不知道我鲁耀的。拿香骨板来唱莲花落,就是从我鲁耀开始的。可惜我弃丐抬扛后,这就绝了后人。

说那一夜,我借宿在马道街南头马市草棚下,那儿有一垛谷草,圆圆盘在贩马交易场的边儿上。四月天气,昼暖夜寒,交易场上旋着没有方向的小夜风,马粪的香味和马道街两边国槐的腥鲜气息,在交易场上兜着圈子。东京城里的灯光,明明灭灭,比徐州、洛阳多了许多,到深夜时,还能不时听几句戏园唤出的包拯腔,又粗又哑,好舒服!我把谷草垛抽出一个洞,钻进去,又用谷草堵了洞口,听着戏文做着梦,肚子圆鼓溜饱,头枕着袈裟,袈裟里还有几枚制钱,睡得痛快差不多就要死过去。那一夜我想:东京人好爽快,我怎的没早点来到东京哩!记不起是我睡着以后戏园歇戏的,还是戏园歇戏了我才睡着的,只记得来日醒时,我推开洞口谷草,日头从东天已跳出好高,斜照在谷垛儿上,把我的眼珠都刺进了脑瓜仁。我揉揉眼,打个哈欠,伸个懒腰,眼珠再从脑瓜里走出时,一下就看到十几个讨饭花子从谷杆堆里钻出来,扑扑拉拉跪在我面前,齐声叫道:

“师傅!”

我一怔。

这些“单杆儿”都是昨儿得了我制钱的花子。他们不含糊地跪在我前边,眼却瞟着站在一旁的花子老汉儿。那老汉见我怔着,眯眼笑,朝我靠了几步。

“贤侄儿,我们是东京的‘竹筒帮’,竹筒吹得粗,人都听厌了,讨不来饭。我饿着没啥,不能饿着这些小杆儿,你就收下他们,立个穷教行,建个莲花帮,做个当家的吧。”

我想了想。

“你的岁数比我大得多……”

“你的道行深,”老汉说,“我在东京要了五十一年饭,唱莲花落的见多了,可就你贤侄才真真是见啥唱啥,逢啥编啥,不是先编后唱的,你要不当

家才是瞧不起我们哩……”

这般的，我入城三天，就立了一个莲花帮，做了当家的。当家的有当家的好处，管着一帮人，逢年过节也必然有礼送来。但当家的要让在行的老少们日日有饭吃，这便是难事。

光绪临末时，我鲁耀改了行当。

丐帮不漂流，是要慢慢绝食的。能耐再大的杆儿，也不能死插在一地不动，哪户人家也不肯终日打发面熟的叫花子。

终于，当“知客”了。

知客是殡葬婚娶中的帮忙打杂人。诸如招待客人，烧纸递香，搀扶孝子，收拾桌面，端菜添酒，担水扫地，洗锅涮碗；代婚娶主家收拾洞房，搬运陪送嫁妆，招待贺宾，安桌让座，次日回门引婿，祭祖行礼，拜见岳家亲辈，如此等等，七七八八，都是知客的活儿。做一次知客，不仅有几天的好酒好菜，而东京红白事，向来有“捎包”习俗。为了酬谢知客帮忙辛劳，一般是白事赠送单数礼品，红事赠送双数礼品。礼品也大都是吃食如蒸馍油货和纸封制钱。为了肚子，我鲁耀也少不掉四处打听谁家死人，谁家娶媳，偌大个东京城，红事白事总不间断。

遇了白事，走过去，首先在死人灵前磕三个响头，烧一撮纸，然后找到主人。

“家里缺帮手吧？”

主人怔一下：“不缺。”

“孝子总缺吧，你把我当成儿子孙子都行的。”

主人只好说：“你去问总管，他那儿有事干。”

遇了红事，先在主家门口点放一挂百响小鞭，然后进去说：“我贺喜来了。”

贺喜自然让主家高兴。

“你去问总管哪儿缺人手？”主人说着，递给一个蒸馍，于是鲁耀他就成了喜知客。

知客做得久了，程序熟了起来，慢慢办事就越发干练，殷勤周到，开始有小户人家请他做总管。他也能处处为主人着想，筹办筵席，购买肉菜，封礼收礼，都十分节省，一时间竟成了东京城的红白人物，连高门大户遇事也得请他操劳。

说这年夏天,多雨,东京城像煮在锅里的猪杂碎,到处都稀稀水水,日头一出来,满城街巷都是反照的光团儿。西城有条胡同叫豆芽胡同,其状也如豆芽一般,胡同口窄小得仅能走进一辆手推车,里边细长,深处稍稍一拐,展出一片地面,亮出一个阔大门楼,这就是豆芽街上的“豆”,户主是在书店街经营土杂货物的“恒大杂货店”的老板,姓程,人称程掌柜。程掌柜的儿子二十早过,定于初三婚娶寺后街一位女子,可因本月天气连阴,雨水勤注,豆芽街地势太低,积水多,阴气大,于喜不利,就把“好期”推后三天,改为初六。怕初六胡同路面不干,又专门推来一车沙土,在胡同口的豆芽尖上堆起一个小坝,以防主街上的雨水再往里灌。到了初五这天,街上还存着积水,胡同里却干了路面。

这当口,他来了。

“程掌柜。”

“有事?今天恒大杂货店不开业。”

“贺喜贺喜!我姓鲁名耀,明儿来给你老打打杂,做做下手咋样?”

程掌柜是个讲究人,看看他长袍上的一身脏污,说:“谢谢了,我人手齐全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真的。”

站一会儿,他猛一转身,走了。

初五夜,程家好不热闹忙乎,一个豆芽胡同进进出出,塞满已来帮忙的喜知客。拉桌搬椅,砌灶蒸馍,动刀切菜,丁丁当当,吆七喝八,人手其实极缺。

他站在豆芽梢儿上,望着那一派景致,呆了大半天,摔出了一句话:

“奶奶的程掌柜,看你让不让老爷当知客!”

说毕骂完,就隐进树影里。

三更时分,知客散尽了。五更时分,程掌柜睡不着,起床推门一看,可了不得,长长的一条豆芽胡同,满是积水,腿膝盖儿深!在清清的月光下,明明亮亮,堆在门楼下的桌椅板凳,船样在水面游动。连夜蒸下的一簸箩白馍,泡在水里成了白浆。程掌柜心里忽悠一下,腿一软,差点倒下去。他哗哗趟着积水,到胡同口一看,那沙土小坝被人掘开了,满街雨水都灌进了胡同。日头一出,新媳妇的花轿就要抬过来,程掌柜急坏了。知客们

都不在,他只好找来铁锹,堵住坝口,亲自用桶往外倒水。哗啦——哗啦——没几下,已累得腰酸背疼,脚下又冷得寒颤,便“娘”地叫一声,直起腰,道:“我得罪你们谁了呀!”

这当儿,从街头晃过来一个人,走路一摇一摇的,在水色的月光里,像竖漂的一截黑木头。他摇到胡同口时站住了。

“程掌柜,一早就忙呀。”这人就是鲁耀。

掌柜叹了一口气:“人心都叫狗吃了。”

“看你老年纪这么大,怎能干了这活儿?”鲁耀说着,将长袍往腰间一挽,脱掉鞋子,跳进水里,操起水桶,哗哗就倒起水来。瘦身子一弯一直,一提一桶,比掌柜的手儿快了许多。

到天将亮时分,月落了,仅余几粒星星在城上空闪着,街面朦朦胧胧,国槐的影子都融进了黑色里。豆芽胡同的水也基本完了,鲁耀丢下水桶,扶腰站起来,朝身边的主人看了看,笑一下。

“不误你家娶媳妇吧程掌柜?”

“我不亏待你。”程掌柜说着,回身在门楼下取来一兜蒸馍,递给他,“晾干就能吃。”

看那馍都是经过水泡的,鲁耀没有接。

“饭时我和知客们一道吃……”

掌柜说:“我家知客人够了。”

把眼吊起来,鲁耀将桶扔到墙根下。

“程掌柜,东京的红白事,还没有谁家不请我鲁耀去充知客的。”

程掌柜很坦然地笑一下。

“下次吧,我家二少明年娶。”

他转过半边身。

“那我就走了。”

“多谢你帮忙……”

走了半步,他停下来。

“真走了……”

掌柜朝豆芽胡同里转过身。

“不远送。”

再没说啥,他从程掌柜手里夺下那一兜水泡蒸馍,三脚两步就出了胡

同口，朝着鼓楼大街走去。

东天已经透红，日头露出半张脸。东京城干干净净，树在红光里微微摇着，叶子嫩得滴水，房屋楼店都洗得了无纤尘。豆芽胡同口的两侧，大红“喜”字已经贴了出来，极为醒目招人。就这时候，忽然来了两个讨饭花子，一人手举托盘，上摆米糕、芝麻条、烧饼、油饼各一个，为四色礼品，一人手拿浏阳产的百响小鞭一挂，到胡同口“砰啪”一放，大声叫着“贺喜贺喜！”朝程家门楼去了。

东京的喜事有规矩，凡送礼的如若不以宾客相接，请上桌吃喝，就需加倍封礼相还。总管的家头放有一叠红纸，就是以备封礼之用。一般还礼都在五百制钱到一贯之间。自然，“杆儿的”叫花子是不能请上桌的，既然他们托盘置礼送来，就得厚礼还去。

有个快腿知客回去报信，说叫花子贺礼来了。

总管问：“掌柜，还礼吧？”

“还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八百。”

于是总管将八百制钱用红线穿了，红纸一裹，让快腿知客送了出去。

两个花儿接了八百钱，千恩万谢，一再祝福，出了豆芽胡同。

然而，这里前对贺喜的花儿方去，后对紧跟又来。一样的衣服破烂，一样的满脸脏污，一样的四色礼品，一样的浏阳小鞭，一样的拿去程家八百制钱。日未升三杆，程掌柜就接了这样九对贺礼叫花儿，赔去制钱七八贯。

正在应接不暇的当儿，胡同口突然接连鞭响，噼里啪啦，炸得豆芽胡同一抖一抖的。总管以为是花轿来了，措手不及，忙派知客出去察看，谁知竟是二十多个讨饭花儿，全部手举托盘四礼，破衣烂衫，不等鞭炮烟雾散尽，就拥进胡同里，“贺喜！贺喜！”掌柜的，下人给你送福来了！”祝你家早得贵子啊！”叫叫嚷嚷，潮水一般卷到程家门楼下。

总管不敢接礼，接了就需二十贯钱送出，于是忙去问主家。

“咋办？”

“不理他们。”

“不便吧？”

“东京的叫花子百百千千，打发得起嘛！”

如此，总管就把这帮贺人硬拒了，任他们在门楼下恭的贺的吵翻天，就是不派知客去收托盘上的礼。这样僵持了好一阵，叫花儿们看指望不大，就收起托盘，快快走了。

不久，新娘真的来了。一顶花轿被红绿绸布的缠花包裹着，八个轿夫都是民间汉子，身体结实，又懂轿行，一闪一闪，起起落落，缠花在轿上飘飘摇摇，远远望去，像是由南向北移动着的一棵开满花的树。两个响器班，分列花轿两侧，共吹着一曲《百鸟朝凤》，声音舒展昂扬，流水般在街道潺潺作响。看热闹的居民前拥后挤，鞭炮不间断地在人头顶炸响。快腿小二在拐弯处招风见了，忙回身到程家禀报。跟着总管和搀扶就从门楼出来，迎到胡同口上，将红地毯一节一节铺满豆芽胡同。

可事情万万也难以料到，当新娘子到胡同口下轿时，突然从对面人群中又闯出十余个讨饭花儿，都是三十几岁，结结实实，一个个头戴孝布，身穿麻衣，手持招魂幡，齐刷刷地跪在轿前，号啕大哭，声音嘶哑，破喉烂嗓，爹呀娘呀，妻的儿的，哭得惊天动地，真如丧了考妣一样。

事情来得突然，轿夫一见这些汉子孝子，搁下轿子就呆了。响器班一向还没遇见过“红白相撞”，一人止吹，全班就乱了调儿，稀稀拉拉，此起彼伏，慢慢两班响器都止了吹打。街面上除了十几架嗓门的狂哭，就再也没有别的动静。丁点儿也不悲哀，却十分热闹，围观的市民一下把花轿晾到一边，朝着孝子围过来。

新娘子下轿后，原本还有很多程序，可这会儿喜丧相遇，为了躲避，也顾不了许多，一出轿门，搀扶拉上就跑，慌不迭儿，嘴里叫着：“躲邪！躲邪！躲邪！”

新娘子知道自己出嫁遇上了白丧，一过程家门楼，起先还是哀哀地压着嗓子哭，和新郎拜天拜地时，听那门外孝子仍在号吼，越发觉得晦气，便索性哭出音来。娶妻嫁女，本来一桩喜事，没想闹出一片哭声。掌柜急了，叫道：“我哪儿做了孽事啊！”抱头蹲在上房不动了。

总管急了，亲带几个知客出外搀孝相劝，不仅劝不动弹，那十几条汉子孝子反把脸转向豆芽胡同里的程家门楼，哭得更加厉害。没办法，只好回去减了婚娶的烦事，匆匆把新娘送进洞房。找到主人问：

“掌柜的，你得罪下了谁？”

掌柜说：“我得罪过谁？”

“那是几个恶作的叫花儿，像要叫你破财的。”

“豁上吧，每人给一千制钱去……”

一个知客送出去十几贯，一会儿又原封不动把钱拿回来。

“狗日的不要……就死哭，劝不动。”

这时候，一个常做知客的出来说：“这怕要由掌柜亲自出面请鲁耀先生调停哩。”

程掌柜听了，怔了怔，坐在箩圈椅上木着脸，连吸十几袋水烟，让总管带着二十贯制钱出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鲁耀来了，背着袱搭，后边跟着掌柜和总管。他到众孝子面前，从袱搭里取出钱来，朝每个孝子面前扔了一贯，说：“都他妈别哭了，程家总管有事，我接总管了，你们都是知客，快都进屋洗罢脸，端菜上桌，宾客都在等着哪。”

果然，十几条汉子，从头上扯下孝布，擦把脸，把孝布和麻衣往一堆儿卷了，笑嘻嘻跟着鲁耀进了豆芽胡同。

今日东京相国寺中藏的《相国寺竹枝词三十首》中有诗云：

上通抚道下通猴，
屁股常年一片油。
三十六行相国寺，
无人不拜鲁杠头。

这诗是我死后作的。记得在世时，并没有文人这般抬举我鲁耀。人的作为能入诗，能留后人，可想活着也算得有作有为了，不然谁肯枉费笔墨呢。自从在程掌柜家做了总管，我就不做知客了。城内的数百条街道胡同，没有谁家不知道“红白总管”鲁耀的。马道街、相国寺、龙亭、铁塔、禹王台、砚庆观……无论到东京的哪个地方，人们都熟识我，见面不是称我“鲁总管”，就是叫我“鲁先生”。做了总管，成了人物，就有了财存。有了财存，我就在现省府前街买了房子宅院，开了“明记杠局”，成为鲁杠头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在东京有了自己的营寨，开始了我鲁杠头辉煌辉煌的一辈子。

《如梦录》中的《形势纪第二》开头道：

东京地脉,原自西来,故惟西门直通,余四门皆屈曲旋绕,恐走泄旺气也。势如卧牛,故名曰卧牛城。城内周府前有兴龙桥,又有左右西龙须,东自锭匠胡同,往南至大店,过鼓楼而东,由鹁鸽市迤南,东至第四巷,南抵宋门大街止;又自鼓楼往东至五圣角,向南抵宋门大街止,谓之左龙须。西自武庙,往南,至钟楼。

我所置宅院就在卧牛城西南,离钟楼不远,地皮约有半亩余地,房是青砖青瓦,四合院子,院里有梧桐两棵,树皮四季都分外滑润,涂油似的。夏天树皮上生出很多苔丝,地上潮潮一股湿气,十分凉爽;冬天则温暖舒适,宜人可意。到第二年秋天,省府前街有家杠局,经营不善,生意被曹门大街一家杠局夺了,我出面请客,把这家杠局盘让过来,于是,旺火添柴,势头大振。

杠局,是专做抬死人生意的。

我的“明记杠局”临街是三间门面瓦屋,门头上的字号用金色漆了,棺材抬手没有固定身子,都是“莲花落”帮的徒弟们,有死人就抬,就吃喝;没死人就上街去喝去讨。这买卖别无所盼,就盼着东京多死人。多死人才会有兴隆好生意。然东京人并不为杠局多死,要赚钱就要把曹门大街的杠局也掀倒,让明记杠局在东京独家经营,独赚死人银两。

我原想和曹门街杠局好好斗上一番,不想那杠局竟那么稀软,像是纸扎的,经不起我鲁耀一脚踢,只一指碰碰就破倒了。

事情是在过年。大年三十那天,小二过来对我说,当家的,该请先生写对联了,杠局过的是头一个年,对联要吉利。我说,你去曹门大街看看,看他们局的大门上写的啥。

小二跑步去了。

约有一碗饭工夫,小二回来递给我一张纸,上边请人抄了他们局门的对联:

无龙义气高百斗
司马文章壮千秋

两个门板上写的是：

德必有邻
群贤毕至

门额上写的是：

关雎志喜

我把那纸一团，扔了。

“字好吗？”

“请书院先生写的？”

“啥价？”

“一副对联就给了一千。”

“你去，到书店街联市上把写字最差的给我叫过来，一副对联给五贯。”

“掌柜……”

“去，在联市上唤唤，看热闹的越多越好。”

对联市是春节前自成的，每年都在鼓楼北的书店街，路边上摆下桌子，一个挨一个，桌上都放着笔墨纸砚。纸是割好的对联纸，宽宽窄窄的红条儿耷在桌角，砚台压着，在风中哗哗地动。每张桌前，站着一个先生，手插在长袍袖里，有人从前走过，就忙问：“写不写？”人说：“看看。”来吧，不光字好，文也吉利！”价呢？”“随你便。”这就成了。酬劳早已形成惯例死价，无论字好字坏，都要给上百个制钱。只有那些字迹确实不好的，才躲在联市的角落里，歪歪扭扭从老黄历上抄一副，红脸青筋地和小门穷户的主人吵吵争争。

我的小二到鼓楼下站住脚，面向联市大声唤：

“我家掌柜要写对联啦，哪位先生去！”

叫声不落，就有六七个先生提着毛笔抢过来。

“远不远？”

“不远，省府街。”